

第一章 导论：管理哲学家

—— 韦伯

马克斯·韦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一位伟大思想家。在世界范围内，韦伯被公认为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管理学家。

《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一书的译者郭锋先生在此书的译者前言中如是说：“马克斯·韦伯是这样一位思想家、学者，他出生在德国这块欧洲文化底蕴深厚、世界级思想大师辈出的土地上，生活于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进程步调加快氛围下德国‘经济起飞’、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型的时代，他热爱自己的民族、国家，希望民族强盛、国家繁荣，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的共同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怀。他为求真而探索这个世界‘是什么’，更为求善而思考这个世界‘应当是什么’，什么样的社会是人类共同的适宜生活于其中的‘好’社会。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和民族文化自豪感及对德国经济、政治发展一度处于落后地位的焦虑铸就了他的灵魂。他也是一个人类文明进步主义者，从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起源、法的和伦理的力量对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秩序形成的影响入手，比较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为历史的、现实的各种文明社会把脉、诊断，探询适宜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式，寻找解决人类社会现实发展问题的答案，构成了他毕生学术追求的主题。也就是

说，民族魂和人类命运关怀是韦伯的思想和学术性格所在，并成就了他知识渊博、眼界开阔、思想深刻、富于灵感、创见迭出、跋涉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哲学、宗教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皆能多所建树、予人启迪的一生。民族的和人类命运的双重关怀，双重关怀下的学术研究与思想成果，使韦伯这位德国思想家、学者不仅属于德国，也属于世界。’^①

确实，韦伯论述了大量的社会学思想，并从宏观到微观对社会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解剖，从方法论到具体的社会结构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对社会结构进行了合理地建构模型，科层制就是其代表之一。而且，韦伯还开创了新的社会学流派，并为以后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奠定了基础。来自世界各国的一些著名社会学家，如哈佛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巴黎的阿隆（**Raymond Aron**）、伯克利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一致认为，韦伯的地位应仅次于马克思、迪尔凯姆之后，是社会学理所当然的“经典作家”。被公认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另外两位是迪尔凯姆和齐美尔。可见，作为一位社会学家完全是名副其实。

韦伯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在世界历史中，是韦伯对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对世界上比较典型的社会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如中国、印度，最后得出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是由于一种宗教精神——新教伦理所决定的。暂且不管他的结论是否科学，但他这种对历史的分析方法对于历史学具有重要意义。从德国编撰《韦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简称 **MWG**）就可以看出韦伯在历史学中的地位。《韦伯全集》

^① 《马克思·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译者前言”第1-2页。

的出版是韦伯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史上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1974 年成立了出版历史批判版《韦伯全集》的委员会。由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历史学家默姆森教授、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家施路赫特教授（**Wolfgang Schluchter**）和勒普修斯教授（**M. Rainer Lepsius**）、康斯坦施大学的社会学家拜厄教授（**Horst Baier**）以及独立学者文克尔曼博士（**Johannes Winckelmann**, 1985年已去世）等人组成。其中，施路赫特教授可能最为国人所知，他对韦伯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韦伯还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学家。他对于组织的管理理论使他成为古典管理的代表人之一。对于他的管理思想，本文下面还要加以论述，特别是他的科层制理论，对于西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组织管理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正是他的科层制理论，使得西方世界中的组织结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使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本文并不想否认对韦伯的这种评价。但本文作者通过认真研读了韦伯的相关著作以后，发现不仅可以对韦伯作这三种解读，而且还可以作另外一种解读，即作为一位管理哲学家的韦伯。如果说，在西方思想史上真正算作管理哲学家的话，那么韦伯就应该作为首推之一。韦伯在社会学理论上的基本分析思路是通过对社会这一系统进行充分的分析，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某种精神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伦理来实现的。这种分析思路其实是采用了哲学中的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分析的方法，正是整体性思维方式的体现。在这种背景下，能够说韦伯就只是一位社会学家吗？

韦伯的管理思想使他成为世界范围内著名的管理学家，但他的管理思想，特别是科层制理论的基础却是人的本性，

是把人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而没有个人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能依理性来维系，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种对人的看法，究其根本，就是“经济人”的人性假设的结果。这种理论难道仅仅是管理思想吗？韦伯的管理思想是以理性主义作为其深刻的理论基础，如果要真正把握韦伯的管理思想，就必须牢牢地掌握韦伯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科学和人本这两种思潮的矛盾表现。这是韦伯管理思想中的一条主线。

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韦伯不仅是伟大的社会学家，不仅是伟大的管理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管理哲学家。

何为管理哲学？这是本文的基本理论立足点，我们认为，管理哲学就是以管理观为研究对象，对管理理论进行哲学反思和方法论研究的一门应用性哲学，正如西方科学哲学是对科学进行反思的哲学而非“科学的哲学”。具体而言，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管理理论所依据的方法论是什么？管理学理论中各种原则所遵循的依据是什么？

一、韦伯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

韦伯的管理理论包括了许多方面，从国家管理到社会各级组织管理，还有企业管理，内容庞杂，涉及面广，但是作为共同的基础却是其哲学基础，可以说，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也就是一整套宏观的管理理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庞大的管理体系，而在韦伯社会管理理论的背后，是坚实的哲学基础，即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和人本这两种精神的矛盾表现。我们知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是西方流行的两大哲学思潮，科学主义强调知识，强调科学，注重实证方法；人本主义重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重视对人的终极关怀，这种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对西方各门具体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而韦伯的生活年代正是这两股思潮兴起之时，应该说，它们对韦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可以从他的著作和思想中看出。

韦伯在他的代表作《经济与社会》中，具体论述了许多管理哲学的思想，从管理的哲学理论基础到方法论基础，以及管理的基本原则等等。因此，美国著名社会学理论家帕森斯把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译成英文时用了一个与管理非常接近的书名：《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使韦伯的思想在美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考察韦伯的管理学理论，就必须首先考察他的理论的哲学基础。

首先，韦伯的思想来源是受到当时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影响的。他的思想观点和世界观都是在 19 世纪后期形成的，他吸收了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同时也亲身体验到了 19 世纪理性主义危机的新的精神思潮。韦伯终其一生都在关注西方文明中的理性主义的发展，可以说，他对理性和自由事业的深刻信仰，指导了他对研究课题的选择。他的研究结论也是十分明确的，即西方世界的理性和自由正处于危险之中，韦伯就是为了在充分探究启蒙运动遗产的历史前提之后来捍卫人的理性。因此，韦伯的理性观是他整个学说的深刻的理论基础。

韦伯的思想来源既有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论，也有人本主义的个体自由、自由意志等本体，正是由于韦伯的管理思想是确立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之上，使得他的管理思想不同于当时一般的管理学家的管理思想，应该说，正是由于这样的哲学基础，使得韦伯的管理思想远远高于同时代的管理思想，使得他的管理思想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深度更为深刻。

韦伯的这种思想来源绝非偶然，而是他那个时代所赋予给他的。我们知道，在他那个时代，正是黑格尔哲学之后，

德国哲学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后来又出现了新康德主义，以及狄尔泰的释义学，这些思潮的出现，带给韦伯的是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冲突。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等人给了韦伯以社会中的人为研究对象，重视人的问题；而孔德、新康德主义、狄尔泰则给韦伯以某些实证主义的影响。因此，H. 豪斯认为，韦伯“他至少要从事两方面的作战——一方面对肤浅的实证主义或自然主义作战；另一方面，则是在与唯心论思想的传统作战……，由此显示出韦伯是一个强有力的批评者。”^①

正是由于这些思想的影响，使得韦伯的思想来源纷繁驳杂，以致于 Oakes 认为他“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观念论者、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学者、黑格尔学者，甚至是一位存在主义者……”。^②

其次，韦伯管理思想的哲学就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韦伯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对社会的管理。众所周知，韦伯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学家，而他的社会学的主要对象就是由人所构成的社会，离开了人，社会也就无法存在。由于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庞大的管理体系，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韦伯的社会学思想也是他的管理思想，两者其实并不矛盾，而且具有一定的重合性。韦伯的思想基础既有当时流行的人本主义，也有科学主义。

纵观韦伯的整个思想，他想要说明的是社会这一系统如

^① H. 豪斯著，李丰斌译《社会与意识》，台北经联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310页。

^② 陆菲云：“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之断想”，《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年第4期。

何正常运转，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分析了社会中各种团体的宗教信仰与其地位及其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而转到对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最后强调某种精神性的因素作为社会这一系统正常运转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韦伯有时强调了人本的因素，从而具有人本主义倾向。比如他认为，作为地位团体的一个成员，个人是社会组织的产物。因此个人的行动与思想，可以作为社会组织的属性来研究。这种研究明显地是以人的因素来分析社会组织，这样的分析不能不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情结；又比如他在《经济与社会》中就曾用人性来说明城市社会的发展。他说：“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政治地位给自己指明了成为一个经济人的道路，而在古代城邦在其繁荣昌盛的时代，却保留了作为在军事技术上处于顶峰状态的军事团体的性质：古代市民是政治人。”^①这种用人性的观点来说明社会，为后来的管理思想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在古典管理中以泰罗为代表的管理理论就是以“经济人”这种人性的理想类型为理论基础的，而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则是以“社会人”这种理想类型为其理论基础，科学管理理论则是以“复杂人”这种理想类型为其理论基础。应该说，这些管理理论的来源与韦伯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然，我们在说明韦伯的思想具有人本主义理论倾向的同时，我们也认为韦伯的思想中同时具有一些实证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他的理论方法论上。比如他在每一项实证研究中，总是默默地选择一个核心问题，并尽可能地考虑其大量的分支，以此分析所考虑的社会结构。而且往往是选择一个分支系统，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揭示社会这一系统中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论述过程中，往往以大

^① 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 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 第703页。

量的历史事实为材料，进行分析、概括，得出具有普遍性的结论，最后又用经验事实进行验证。这种应该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科学主义的分析方法。

总之，在韦伯的管理思想基础上，主要是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为其哲学基础，这种哲学基础是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的反映，因此，韦伯的管理思想不同于其他的管理思想家，而应称之为管理哲学家。

二、韦伯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韦伯的管理理论一方面是建立在科学和人本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也是建立在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当他把社会作为一个庞大的管理研究时，总要用一些基本方法来进行，这种方法既不是简单的科学的方法，也不是一般的描述方法，而是采用的具有抽象性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中最典型的要数“理想类型”的方法。

关于“理想类型”，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中是这样说的：“在抽象的经济理论中，我们面对着那种人们通常称作为历史现象‘理念’的那种综合的例子。这类理念为我们提供了在交换经济的社会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合理行动情况下商品市场过程的理想图像。这种思想图像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联结到一个自身无矛盾的世界之上面，这个世界是由设想出来的各种联系组成的。这种构想在内容上包含着乌托邦的特征，这种乌托邦是通过在思想中强化实在中的某些因素而获得的。它与经验地给定的生活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凡在由这种抽象的结构所描述的那种关系、也就是依赖于‘市场’的各种事件被发现或被推测到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就能够根据理想类型、根据实际情况来说明这种关系的特

征，使它易于理解。’^① 从中可见，韦伯提出“理想类型”的直接动因，恰恰正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即要想管理好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系统，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方法，而变种方法的哲学基础必须是进行分析式的方法，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这一方法。

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层面对韦伯“理想类型”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更应使我们注意的是，韦伯提出“理想类型”是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而不是简单地作为一种具体方法的，以往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如果把韦伯的社会理论比作是关于社会的管理理论，那么，韦伯的“理想类型”就是关于这一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因此，韦伯的“理想类型”是从属于他的整个管理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至于作为方法的具体运用，韦伯也举了许多例子，如对“手工业”这一范畴的分析，就可见出它的理论特征。“人们可以用完全同样的手法把‘手工业’的‘观念’描画成一个乌托邦，而所用的方式就是把混杂地存在于各个不同的时代和国家的手工业者那里的、其结果得到片面地强化的某些特点，结合在一个自身无矛盾的理想图像之中，并且把它们与人们在理想图像中表达出来的思想观念联系起来。尔后，人们就可以进一步描述一个其中所有经济活动的部门，乃至精神活动的部门都由一些准则支配的社会，而这些准则在我们看来也就是赋予提高为理想类型的‘手工业’新特征的同一原则的运用。”^② 既然“手工业”这样的概念可以运用“理想类型”

^① 《韦伯文集》（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版，第46页。

^② 《韦伯文集》（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版，第47页。

的方法论加以研究，那么管理学的概念、范畴、理论都可以运用、解释。

事实上，韦伯在以后的《经济与社会》中，就采用了这种方法论的基本原理，对社会组织进行了有效的分析，提出了“科层制”的理论和关于权威的三种类型的理论：魅力型、传统型和合法型。该理论对组织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古典组织管理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我们知道，在现实社会中，任何组织都不可能真正做到科层等级制，任何权威也不可能是这种纯粹的形式，但在进行理论分析时，把一些并不很重要的因素排除掉，容易透过现象进入本质，掌握这些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完全按照社会现实，那么永远提不出一个合适的理论，永远不可能进行分析，也不可能用来指导实际操作。科层制就是一种典型的、纯粹的组织制度，而三种权威的分类也是一种纯粹的类型，这些都是这种方法论的体现。

“理想类型”是一种“理念”，是一种理论，它当然是一种研究者思维的主观建构，它存在于人的观念中而不是在现实中。这样，“理想类型”当然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这与任何理论的主观性是一样的，同样，这种“理想类型”不是研究者凭空虚构的，而是来源于现实社会，来源于对现实的组织体系的管理实践，是以理论结构的形式表示了深刻的社会现实，管理实践，因而又具有“客观性”。同时，理想类型作为一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抽象的，但它却是有用的，它“将训练研究中的归源判断：它不是‘假设’，但它将指出假设的方向。它不是现实的描述，但它将给描述提供

明确的表达手段。^① 韦伯在对组织管理进行考察时，就是利用理想类型的方法论，对社会不同的组织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了科层制这一理想制度。因此，它不是对事实进行简单的经验概括，也不是对社会生活的理想化，它只表明某种现象接近于典型，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发现不了这种纯粹的状态，它所表示的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但通过这种可能性，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实性。在经济学和管理学中，如果没有“经济人”的理想类型，就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和解释，也就没有科学的管理模式，西方管理史上也就不会出现泰罗的伟大革命。可见，这种“理想类型”是我们为了有利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建构出来的一种理论体系，这种建构主要是为科学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指导，使人们在分析问题时不受杂乱的现象的干扰，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理想类型的意义还在于思维方式的突破，缓和了在韦伯之前存在的两种思维方式的对立，即实证主义提倡的普遍化的思维方式和历史主义信奉的特殊化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冲突，正是体现了当时的科学和人文思潮的对立，不仅表现在社会学的系统内，而且在各方面都有体现，在管理领域也不例外。在韦伯之后的管理思想史的发展，表明了韦伯这一理论的思维向度是有合理性的。我们知道，在西方管理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讲究科学管理、只注重管理方法和模式的古典管理学派以及后来出现的管理科学学派，这些学派的共同特点是把人当作工具，追求的是普遍的管理模式；但后来出现的人际关系学派则强调把人作为对象，作为

^① 《韦伯文集》（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版，第46页。

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工具，他们所追求的就是对工人个体的关怀，因为每一个工人都是一个对象，只要对工人的热情关怀，就能提高生产效率。以后出现的经验学派，也不承认有什么普遍适用的管理模式，他们所追求的是那些成功企业的管理经验，只要向那些成功企业学习，学习他们的管理经验，就会对自己的企业管理有所帮助，同样会提高生产效率。可见，在西方管理思想史上，这种对立的思维方式还是存在的，但实践证明，只有打破这种僵硬的对立，才能使管理上一个层次，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

三、韦伯管理理论的基本原则——合理性

韦伯的管理思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合理性。“合理性”这一概念来自于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中，是作为最重要的哲学范畴而出现的，其意义是指“合乎理性”，即符合“绝对精神”，在他的哲学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凡是现实的 都是合理的 ;凡是合理的 都是现实的。”由于这句话的来源，使得合理性的理解具有独特的含义。在韦伯那里，合理性即是合乎资本主义的精神。

韦伯的管理组织管理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实现一个组织的目标，要把组织中的全部活动分为各种基本的作业，并作为公务分配给组织中的各个成员；各种公职和职位是按照职权的共同原则组织起来的，每一个职位都有明文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形成一个指挥体系或阶层体系；在组织中，人员的任用完全根据职务上的要求，通过正式考试或教育训练来实行。第二，管理人员要有固定的薪金和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成为“职业化”人员。管理人员必须严守组织中的规则和纪律。这些规则和纪律不受个人情感影响而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第三，组织中人员之间的

相互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的关系。韦伯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它的组织体系。这种集权的组织结构，是一个高度结构化、规范化、不受个人支配的组织。这种组织的核心是理性，只有理性，才是形成组织的基本条件，只有理性，才能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只有理性，才能使组织有效地与外界联系，一切的重点，就在于理性，可见，理性作为组织的重要基础。

形成组织靠理性，对组织的管理也得靠理性。韦伯在论述合法型统治时，谈到了合法性的基础也在于理性。他是这样说的：“通过协议的或强加的任何法都可能以理性为取向，即目的合乎理性或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并制订成章程，同时有权至少要求团体的成员必须尊重它，然而，一般也要求在这个团体的权力范围内（倘若是区域团体，就是在区域之内），落入团体制度视为重要的社会关系或者采取社会行动的人们，必须尊重它。”^①这就是说，任何管理都有一定的法则，通过这种法则，转化为章程，而这种章程是保障组织管理得以进行的基础，这一切都是通过合理性才得以实现，可见，合理性是整个组织管理的基本原则。这种合理性有两类：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在具体的组织管理中，对于这两者的关系，韦伯认为：“行政管理班子对统治者（或统治者们）的服从，可能纯粹出自习俗，或者纯粹由于情绪，或者受到物质利害关系，或者受到思想动机（价值合乎理性）所约束。这类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统治的类型。在这里，在统治者和行政管理班子之

间的结合，出自纯粹物质的和目的合乎理性的动机，就意味着像通常那样，结合的持久性比较起来不稳定。一般还有其他的——情绪的或者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在非日常的情况下，可能惟有这些动机是决定性的。在日常生活中，习俗，除此而外，物质的即目的合乎理性的利益，主宰着统治者和行政管理班子的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然而，习俗或利害关系，如同结合的纯粹情绪的动机或纯粹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一样，不可能构成一个统治的可靠的基础。^①这段话说明了两种合理性的关系，只有目的合理性或只有价值合理性都是不够的，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实行真正的组织管理。

这两种合理性的类型，也就是以后韦伯所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目的合理性就是形式合理性，价值合理性就是实质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它反映的是客观的事实关系，受到客观物质世界的限制和制约，因此，形式合理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它反映的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情感、思想等因素，它受到人的现代化条件的限制，因此，实质合理性则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现代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科层制）是高度合理的。

韦伯的合理性原则，对于西方管理思想，特别是组织管理理论起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使得西方的组织管理比较稳定，减少党派、政治等因素对组织的影响。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第238-239页。

总而言之，韦伯作为一个管理哲学家是完全称职的，他对管理的理论基础作了哲学考察，用哲学方法论来分析社会这一大的组织，用合理性原则作为组织的指导原则。如果说，西方有管理哲学家的话，那么，马克斯·韦伯就是第一个。既然是第一个，也就必然表现出许多不成熟之处。如对于管理哲学的基本范畴的构建，管理哲学的体系，等等，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第一个西方管理哲学家而影响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管理思想。

第二章 韦伯管理哲学的理论来源

要考察韦伯管理哲学的理论来源，首先就要考察韦伯的生平历史。我们知道，一位伟大思想家的出现，既有一定客观历史背景，又有一定的特殊家族影响，而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主要是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考察韦伯的生平历史，就是为了说明韦伯管理哲学产生的客观历史背景，从而可以看出韦伯管理哲学形成的必然性。通过对韦伯的生平考察韦伯的生平，还可以看出韦伯思想的发展轨迹，对于正确理解韦伯的管理哲学的思想来源也是大有裨益的。

一、历史的考察：生平介绍

卡尔·埃米尔·马克斯米利安·韦伯(Karl Emil Maximilian Weber 1864 - 1920) 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市，其父老韦伯是法学博士，当过地方法官，任过议员，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宗教倾向上，他是一个新教徒，但又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他们夫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而韦伯的母亲海伦妮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这样一个家庭，对于韦伯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由于老韦伯热衷于政治，使得家中经常是高朋满座，而在这些人中，大多是当时上流社会的著名人物。其中如政治家本宁森、米奎尔(Miquel)、卡普(Kapp) 霍布雷希特(Hobrecht) 以及学者狄尔泰(Dilthey)、戈

尔德施密特 (Coldschmidt)、特奥多尔·蒙森 (Theodor Mommsen)、西贝尔 (Sybel) 和特赖奇克 (Treitschke) 等人都是家中的常客。他们主要谈论政治和学术，这种交往和讨论对青年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它创造出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可以说，在青年时代，家庭背景和优秀的德国中等教育对韦伯的影响甚大，培养了韦伯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为韦伯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而韦伯家庭中的宗教气氛对于韦伯后来专注于宗教研究也不无影响。

韦伯的祖父卡尔·奥古斯特·韦伯，在西法里亚的贝莱菲尔德经营一家德意志——英格兰式纺织厂，是贝莱菲尔德商会会员。多年来，祖父在孙子马克斯眼里，一直是一个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榜样。韦伯的叔叔达维德·卡尔·韦伯，后来继承了家族的工厂，并引进了现代经营管理方式。达维德在马克斯心目中则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楷模。正是这两个人，对于韦伯今后的管理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870 年，马克斯·韦伯进入柏林一家私立学校德贝林学校学习，两年后转读皇家女王——奥古斯特——大学预科学校。这期间，韦伯读书很多，主要是史学著作、古典作品和哲学著作。关于史学著作，他主要阅读的是特奥多尔·蒙森 (Theodor Mommsen)、恩斯特·库尔提乌斯 (Ernst Curtius) 的著作；关于古典作品，他主要阅读的是荷马、希罗多德、西塞罗、扎卢斯特 (Sallust) 和维吉尔的作品；在哲学方面，他主要阅读了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康德的著作。这对他今后成为一个出色的管理哲学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今后从事的研究方向。1877 年圣诞节期间，他写出了两篇论文：“皇帝和教皇统治时期的德意志历史进程”和“从康斯坦丁到民族迁徙时期的罗马帝国时代”。早在 14 岁时，韦伯就开始与其表兄、正在柏林读书的弗里茨·鲍姆加滕通信，